



随着学者从政现象的普及,“学院派”背景官员出任的岗位,也在发生变化。初入仕途之时,他们一般都任职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职位。如今,经过并不算长期的历练,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身居要职

学者从政新常态

2017年6月17日,49岁的邢善萍当选为山东省常委、山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实现了人生的又一次跨越。

邢的高校背景受到外界的关注,此前她曾出任山东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也曾长期在负责高校党建的省委高校工委工作。

记者注意到,最近不到一个月,已有多位昔日的大学校长履新要职,学者从政现象再次引发外界关注。

事实上,最近几年“学而优则仕”的事例越来越多。受访专家认为,学者从政是一种趋势,已逐渐成为中央人事任命的一种新常态。

履新的前校长们

6月15日,国务院发布任免消息,任命侯建国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此前,侯建国更为人们熟知的身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他在中科大学习工作了二十多年,最早是基础物理教师,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在校内,他有实干家的口碑,在中科大任校长的7年间,力推“学术优先、教授治校”理念,带头不再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学生中享有“亲民”的盛名,中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将他评价为“1987年以来最好的中科大校长”。

侯建国的继任者、中科大校长万立骏近日也步入仕途,5月底刚宣布出任中国侨联党组书记,6月9日即当选为中国侨联第九届委员会主席。

万立骏是日本归侨,早年曾在日本求学,并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执教。上世纪90年代未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后回国,作为物理化学家。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5年,接替侯建国出任中科大校长。万立骏同时还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在稍早之前的6月1日,中组部宣布由李晓红接替周济,出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现年58岁的李晓红此前曾担任过武汉大学和重庆大学两所高校的校长;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致力于水射流技术及其在煤矿安全工程中的应用。

2016年,李晓红从武汉大学校长任上调入教育部,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如今仅过了半年,就出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晋升为正部级。

在最近履新的前校长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陈吉宁,他于上个月底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代市长。

在中国政坛,陈吉宁被视为“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代表,他拥有多个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前在清华大学学习工作了二十多年,2012年,开始担任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掌门人;2015年,51岁的陈吉宁调任环保部出任部长,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他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最年轻部长的纪录。由于他本身就是环境科学方面的权威专家,他的这一由学入仕更被外界视为学者专家从政的良例。

作为本届中央政府的首位“60后”内阁成员,陈吉宁掌舵环保部期间的政绩也颇令人注目,他上台当年号称“史上最严环保法”开始施行,大力推进环保督查问责,他的副手多数都是拥有博士学位的环

保专家。

陈吉宁此次履新,主政首善之区,外界认为是中央对他从政能力的高度认可,他的环保权威专家背景也令人对北京的环境治理充满期待。

学而优则仕

近年来,在中国政坛,学而优则仕的事例,不断上演。

上个月刚当选为海南省省长的沈晓明是中国儿童环境医学的主要开拓者,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他关于儿童铅中毒的研究推动了我国汽油无铅化的进程,他也是国内新生儿听力筛查的重要推动者。

今年4月,当选为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的阴和俊也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早年在太原工学院任教,后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是研究电波传播、电磁场理论与微波技术的专家,曾任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所长、高科技局局长、副院长,2015年入仕,出任科技部副部长。

最近刚刚履新海关总署党组书记的倪岳峰实际上也有过短暂的高校工作经历,他曾在合肥工业大学执教3年多,后来在清华大学攻读了博士学位后从政。

今年年初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的戴玉林也有类似经历:曾在辽宁财经学院和东北财经大学任教长达16年。

去年3月,履新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的曹卫星,此前也曾长期在南京农业大学工作,入仕之前是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

其实在2015年,高校学者从政的现象就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趋势:

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早前也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45岁时返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出任校长,是当时全国所有副部级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用人新常态

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学者从政的用人思路已有体现。

2013年,在清华学习工作了近30年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调任浙江,出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开启仕途之旅;2015年,调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去年当选为陕西省省长。

胡和平与陈吉宁是清华同事,两人经历也颇为相似:2006年,被同时提拔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当时两人分别是人事处处长和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现任中组部副部长陈希,当时是胡和平与陈吉宁两人的顶头上司,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2008年,55岁的陈希离开清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此后仕途经历颇丰:历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2013年进入中组部,出任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长。

陈希也是“老清华”,自1975年在清华化工系就读以后,直至从政之前,从未离

开过清华。

目前出任要职的一批高官中,具有“学院派”背景的人不在少数。

例如,法律界熟知的知名法学教授徐显明,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前校长,2013年从政,出任过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学者从政)肯定是一种趋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期的社会管理难度增加,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趋势,必然对官员的知识程度、执政水平要求越来越高。

早在2014年,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即透露出这种信号,其中明确提到,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当时中组部负责人在解读上述文件精神时谈及要优化领导班子知识专业经历结构,也提到文件要求:重视充实熟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干部,充实实践经验丰富、勇于改革创新、善于做党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社会管理工作、群众工作、法治工作的干部。

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央某些人事调整的用意了:环保专家陈吉宁入仕出任环保部部长,财政金融专家陈雨露入仕出任央行副行长,网络软件技术专家怀进鹏入仕出任工信部副部长,侯建国、阴和俊等科学院院士入仕出任科技部副部长,等等。

就在上述纲要发布的当年,北京市推动了第二批高层次党外人士挂职北京市政府部门和市属国有企业,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知名教授施一公挂职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挂职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

外界普遍认为,与从基层党政机关一步步晋升的官员相比,从高校步入政坛的学者官员经历背景相对单纯,这可以成为他们的一种先天优势。

受访专家认为,“学院派”高官更具有专业化、开放意识和国际视野,他们的简单背景会令决策更加中立超脱且较少受到掣肘,他们的学者天性会令他们思想更为活跃开放且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强。不过,他们可能在政治经验上有所欠缺,尚需历练。

竹立家认为,学者从政的增多体现了中央用人的新思路、新常态,在未来的中国政界,学历、知识结构将成为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

随着学者从政现象的普及,“学院派”背景官员出任的岗位,也在发生变化。初入仕途之时,他们一般都任职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职位,过去高校学者入仕也多数集中于教育文化、科技等部门。如今,经过并不算长期的历练,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身居要职,进入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实权要位。

外界认为,这批高官在政坛的崛起,将对中国治国理政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据《法治周末》

中央最急需的干部要填写90多个表格

刘成良最近写了篇文章《在基层做扶贫干部是怎样一种体验》,为基层扶贫干部发声。文章发出后,很多认识他的干部跟他联系,说终于有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刘成良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他先后在宁夏、湖北、江西、广西、云南、河南调研扶贫工作。在各地调研时,他不仅对参与扶贫工作的不同群体如县乡干部、村两委干部、贫困户、一般群众进行访谈,还深入实地,与扶贫干部一起填写材料、跑项目、做群众工作、开群众会等。

刘成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女性扶贫干部,有一次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自己边哭边做了一个晚上的扶贫材料。

说到文章的影响,文章发出后,半月谈很快进行了转载,很多干部看到了这篇文章后和我联系,说终于有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记者:扶贫干部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刘成良:扶贫干部的主要工作状态就是“辛苦”,自上而下的任务、要求非常多。精准扶贫强调精准,意味着要做大量的调查,数据材料以支撑精准的要求,并且上级要求完成任务的时间又很紧迫,各项的考核监督又非常多。

不同时候,上面来的任务不一样,每天的安排也不一样,比如上级突然来文需要某项报表或者数据,那么干部们就可能从早到晚地在村里忙这些材料。或者如果上级要来检查,干部们就会从早到晚地忙着整理各项档案材料,甚至是通宵。有些时候,扶贫干部一天都会在外面开会,或者跑项目。

我接触到的部分参与扶贫工作的是年轻的、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女孩说得很形象,有一次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她自己边哭边做了一晚上,扶贫材料实在太多了。

所以说,这些材料填写的工作占用了扶贫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意味着他们做扶贫的实际工作时间和精力就少了很多。当然,除了整理材料,干部们做实际工作的时间也是有的,干部抱怨最多的就是材料工作多,耽误了做实际工作的时间。

记者:你提到扶贫干部要填90多个表格,这些表格都是哪里要的?

刘成良:现在政府部门一般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攻坚指挥部,下设若干个专责小组:农业、水利、交通、教育、发改、移民等部门,这是一种统分结合、部门协作的方式,因此各项表格的来源也是多样的。

基层工作是综合性工作,很难进行科层制分工,这是一种基本运行常态。对于乡镇来讲,基层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将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在我们国家的五级行政管理体系中,乡镇处于末梢地位,往往是几十个人对接上级几十个部门,落实到人上面,有些乡镇干部一个人就要负责多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并且乡镇还需要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科层制的那些东西很难和农民对接,农民素质层次高低差异很大,面对一个表格,很多农民看不懂,基层工作没办法按照现代城市规则来开展。

据北京青年网